

# 高句丽太王陵墓主“广开土王”说的反思\*

## ——出土铭文铜铃再研究

赵俊杰<sup>1</sup> 马健<sup>2</sup>

(1.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2. 长春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关键词:**高句丽, 太王陵, 墓主, 铭文铜铃, 广开土王, 故国壤王

**摘要:**本文通过对太王陵出土铭文铜铃的考察,否定了以往学界关于太王陵墓主“广开土王说”的依据,指出该铜铃为高句丽广开土王在即位元年(391年)制造的祭祀父亲故国壤王的器物,也不排除其为随葬品的可能。太王陵墓主当为故国壤王,相应的,将军坟或为广开土王陵。

**KEYWORDS:** Goguryeo, Mausoleum of King Gwangaeto, Tomb occupant, Bronze bell with inscriptions, King Gwangaeto, King Gogugya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inscription on a bronze bell from the Mausoleum of King Gwangaeto, the authors challenge the dominant viewpoint in previous literature that the occupant of the mausoleum belonged to King Gwangaeto. Instead,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is bell was made in 391 A.D. by King Gwangaeto as a sacrificial offering to his passed father King Gogugyang or as a burial good. In this case, the occupant of the Mausoleum of King Gwangaeto should belong to King Gogugyang, and accordingly the so-called General's tomb should belong to the mausoleum of King Gwangae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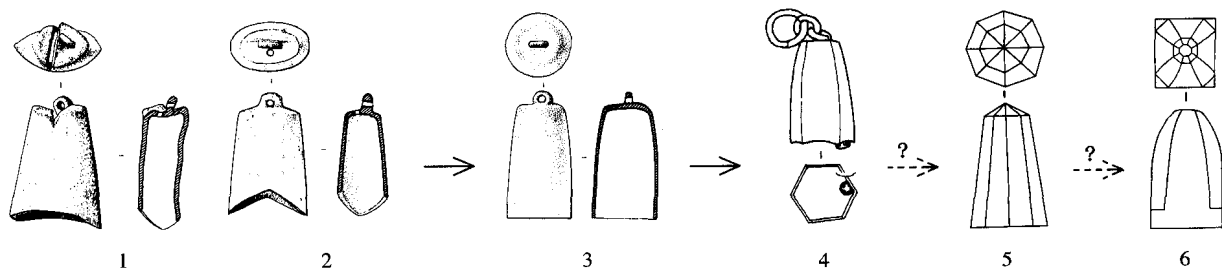
王陵的确认与墓主的推定历来都是高句丽考古的重要课题之一。自上世纪前叶起,太王陵就以其巨大的规模成为高句丽积石墓王陵的重点研究对象,但学界对其墓主的争论多年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近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位于集安的高句丽积石墓王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与发掘<sup>[1]</sup>(发掘报告以下简称为《王陵报告》),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同时,发现的新材料也引发了新一轮的研究高潮,其中尤以出土“辛卯年好太王口造铃九十六”铭文铜铃的太王陵最为引人注目。《王陵报告》将此铭文铜铃视作该墓为广开土王陵的重要证据,最近又有研究将铭文中未释读的一字释为“峻”字<sup>[2]</sup>(以下简称“峻字说”),更强化了这种认识,但却都未提出有说服力的依据。从字面上看,铜铃铭文的问题点有三,一为“辛卯年”的对应年代,二为“好太王”的指代对象,三为铭文第七字的释读。本文拟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管窥,旨在检讨已有广泛

影响力的太王陵墓主“广开土王说”,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 一、“辛卯年”对应年代推定

对于“辛卯年”的绝对年代,目前学界主要有公元331年、391年与451年三种观点,其中331年为高句丽故国原王元年,391年为广开土王元年,而451年则为长寿王三十九年。持“331年”说的学者推定太王陵为故国原王陵<sup>[3]</sup>,此见解值得商榷。首先,从高句丽积石墓王陵的构造以及出土瓦当的谱系看,千秋墓→太王陵→将军坟(箭头代表年代由早及晚)的演变序列最为清晰,三者前后相继,中间并无缺环;再者,研究者普遍认为将军坟为积石墓王陵发展的最后阶段,时代晚于将军坟的王陵均应为封土石室墓。若将太王陵比定为故国原王陵,即使抛开长寿王不谈<sup>[4]</sup>,也仍然会导致继故国原王之后即位的故国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1CKG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D085)与吉林大学基本业务费项目(2011QG006)研究成果



图一 B型青铜铃与石碑的样式演变

1. 03JMM1000: 37(BI式) 2. 03jym541: 201(BI式) 3. 03JYM541: 123(B II式) 4. 03JYM540: 4(B III式)  
5. 山城下 M1411 石碑 6. 禹山下 M1408 石碑

壤王与广开土王陵面临仅有将军坟可以对应的尴尬局面。其次,迄今已知的文献材料中,“好太王”均指广开土王,并无指代故国原王的实例,而331年距广开土王即位尚有六十年之遥,因此该说应者甚少也在情理之中。较之“331年”说,后者因均与广开土王相关联而明显合理得多。目前学界普遍支持“391年”说,但多为理性推测而缺乏直接证据,若“辛卯年”为451年,将铜铃解释为长寿王祭祀父亲广开土王(好太王)的遗物亦不无道理。我们注意到,迄今各方学者对于“辛卯年”的推定,均以对铭文判读与太王陵墓主的推定结果为前提,却忽略了对铭文载体—铜铃本身的考察,而对上述两个前提的研究却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这必然会导致对“辛卯年”认识的分歧。本文尝试以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考察铜铃形制所体现的时代特征,来解决“辛卯年”的对应年代问题。

目前已报道发现青铜铃的高句丽墓葬有山城下195号墓<sup>[5]</sup>、万宝汀242号墓<sup>[6]</sup>、千秋墓<sup>[7]</sup>、太王陵与禹山0540号墓<sup>[8]</sup>,出土的青铜铃按形制的不同可分两型。

**A型:**铃身肩部平直,有长环形鼻,下部稍圆,中部有对称的长条镂空,中有小石子铃舌,山城下195号墓与万宝汀242号墓的出土品属该型。

**B型:**铃身上窄下宽,整体似甬钟形,顶面中间设一半圆形钮。按铃身形态的演变可分三式。

**I式:**顶面椭圆形或橄榄形,铃身圆柱状,铃口内弧或内凹,如标本千秋墓03JMM1000: 37(图一,1)、03JYM541(太王陵): 201(图一,2)。

**II式:**顶面近圆形,铃身圆柱状,平口。标本太王陵03JYM541: 123(图一,3),本文探讨的铭

文铜铃亦属该式。

**III式:**顶面六边形,铃身呈六棱柱状,铃口六边稍内凹,均出土于禹山M0540。标本03JYM0540: 4(图一,4)。

总体而言,B型铜铃的顶面形状经历了椭圆形→圆形→多边形的演变,铜铃的整体形态也由扁平向圆鼓丰满发展。如果不拘泥于铃这一器型,从更宏观的样式角度观察,集安山城下1411号墓与禹山下1080号墓<sup>[9]</sup>墓前竖立的所谓“石碑”(图一,5、6)的形态有可能是此种样式的后续发展阶段。

万宝汀242号墓中A型铜铃与“S”型衔镢共出,该墓发掘简报根据这种衔镢与洛阳烧沟汉墓II型衔镢的相似性,推定该墓的时代约为3世纪末<sup>[10]</sup>,可知A型铜铃时代较早。由于本部分重在探讨太王陵出土B II式铜铃的时代,因此对于A型铜铃不再赘言。

上文提到,千秋墓的时代早于太王陵已成定论,而伞座泡饰的演变表明禹山0540号墓的时代要稍晚于太王陵<sup>[11]</sup>。禹山0540号墓的B III式铜铃出土于东耳室内,说明铜铃与墓葬时代基本相当。该墓圜室内出土四耳展沿壶4件,已复原其中的2件,器型颈部粗短、腹部圆鼓,具有相对较早的时代特征。加之这4件四耳展沿壶中仅1件为釉陶器,釉陶器在陶器组合中所占比例较之集安麻线沟1号墓<sup>[12]</sup>、长川2号墓<sup>[13]</sup>的出土品明显偏低,属于高句丽釉陶初创期的产品,据此我们认为禹山0540号墓的时代可能约为5世纪前叶<sup>[14]</sup>。由此结果反推,太王陵B II式铜铃的时代可能约为4世纪末5世纪初,那么“辛卯年”当为公元391年无疑。

## 二、“好太王”称号指代对象分析

太王陵已经过多次考古调查与发掘,“愿太王陵(峻)安如山固如岳”铭文砖几乎每次都有发现。好太王碑碑文记载广开土王号“永乐太王”,以往我国学者普遍根据此铭文砖中的“太王”铭文推定太王陵为广开土王陵,《王陵报告》又将2003年度发掘中出土“辛卯年好太王□造铃九十六”铭文铜铃视作该墓为广开土王陵的力证。然而,“太王”与“好太王”称号是否专指广开土王?日本学者武田幸男已经对“太王”号的使用实例有过详尽的探讨<sup>[15]</sup>,彼原启方也曾有精彩的论述<sup>[16]</sup>,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补充了《三国史记》中涉及“好”这一称号的相关记载,列表一。

从出土文献分析,“太王”号最早出现于故国原王时期,直到长寿王,甚至文咨明王时期仍被使用,跨度从4世纪中叶至6世纪。如好太王碑碑文所言:“二九登祚,号为永乐太王”(第一面第5行),“太王”号在广开土王生前就已经使用,显然这应是高句丽王的尊号而非非谥号,因此才会出现多位高句丽王都曾被称为“太王”的情形。“好”与“圣”的性质则不同于“太王”号,类似中原王朝用于帝王谥号的“文”、“景”、“昭”、“穆”,应当属于“美谥”的范畴,考虑到目前尚不能遽断其使用在高句丽王生前还是死后,因此称之为“美称”似更为稳妥。笔者注意到,上表出土文献的内容中凡出现“好太王”者均专指广开土王,涉及其他高句丽王的称号中未见“好太王”。牟头娄墓墓志铭中“圣太王”称号虽

表一 金石文与传世文献中“好”与“太王”称号出现的实例

出处	年代	编号	金石文(文献)内容	指代人物	位置
好太王碑碑文	414年	①	国罍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	广开土王	第一面第4行
		②	国罍上广开土境好太王	广开土王	第四面第5行 第四面第8行
		③	永乐太王	广开土王	第一面第5行
		④	太王	广开土王	第二面第4行 第二面第7行
		⑤	国罍上广开土境好太王	广开土王	第三面第2行
		⑥	太王	广开土王	第三面第7行
壶杆塚出土壶杆铭文 <sup>[17]</sup>	415年	①	国罍上广开土地好太王	广开土王	第4行至第5行
牟头娄墓墓志铭 <sup>[18]</sup>	5世纪前叶	①	国罍上圣太王	故国原王	第10行至第11行
		②	国罍上□□土地好太圣王	广开土王	第44行至第45行
中原郡高句丽碑文 <sup>[19]</sup>	449年/495年	①	高丽太王	长寿王/文咨明王	前面第1行
		②	太王国土	长寿王/文咨明王	前面第6行 左面第3行
瑞凤塚出土银合杆铭 <sup>[20]</sup>	451年		太王教造合杆	长寿王	盖内 外底
太王陵出土铭文砖	4—5世纪		愿太王陵(峻)安如山固如岳	?	铭文砖长侧面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①	好壤王	美川王	美川王条
		②	明治好王	文咨明王	文咨明王条
		③	阳岗上好王	阳原王	阳原王条
		④	平岗上好王	平原王	平原王条

与之相似,但略读整篇墓志铭便可知该墓志铭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后文中出现的“好太圣王”称号指代广开土王无疑,那么前者必然指代在位于广开土王之前的某位高句丽王(故国原王)。综上所述,“好太王”应为对广开土王的专称,其他高句丽王的称号或谥号必然与之不同,“好太圣王”这一称号很可能是牟头娄墓墓志书写者对广开土王的溢美之辞。若将其割裂开来,则“好”、“圣”或“太王”中任何一个均不足以专门指代某位高句丽王,因此仅凭太王陵出土的“愿太王陵(峻)安如山固如岳”铭文砖尚无法断定该墓为广开土王陵。退一步讲,若该墓确为广开土王陵,那么将墓砖铭文写作“愿好太王陵(峻)安如山固如岳”岂不更为直接明了!因此,一些学者仅凭一个“好”字便断定太王陵为广开土王陵的认识显然失之武断。

### 三、对铜铃铭文第七字考释的认识

通过上文的讨论可知,铭文铜铃确系广开土王元年—公元 391 年所造,假设太王陵果真为广开土王陵无误,那么其在即位当年制造的铜铃为何出土于自身的陵墓旁,以及这与什么样的行为相关联本身就值得思考<sup>[21]</sup>。无论如何,肯定太王陵为广开土王陵这一前提就成为假设成立的关键,随着“峻字说”的提出,问题的焦点便集中到对铜铃铭文“辛卯年好太王□造铃九十六”中第七字的释读上。结合《王陵报告》的铭文电子扫描摹本与《东北史地》所刊照片<sup>[22]</sup>(图二)观察,此字上部一横较为清晰,且将字的下半部完全包括进来,横

线下左侧部分形似“北”字左半边,其余部分辨识较为困难,字体构成似为上下或半包围结构。我们注意到,千秋墓出土的 Ab 型“千秋万岁永固”铭文砖中存在“秋”字左侧“禾”旁第二笔与右侧“火”字两点共用成横的例子<sup>[23]</sup>,因而不能排除该字为左右结构的可能。但是,该字下半部却似乎并无“峻”字般有如此多的笔画,即使勉强将其释读为“峻”字,字形也与同墓发现的“愿太王峻安如山固如岳”铭文砖中“峻”字相差甚大。最重要的是,“辛卯年,好太王峻,造铃,九十六”的释文不符合古人行文习惯,文意不通,而将此字释为“巫”、“所”,甚至“令”字的看法,姑且不谈正确与否,倒都能贯通文意。无论从字形或释义上看,“峻”字说显然失之偏颇,因此笔者认为铜铃铭文第七字不可能为“峻”字,以“峻”字说为前提推导出的太王陵为广开土王陵的结论也并不能成立。

### 四、太王陵墓主之拙见

以本文所见,太王陵“广开土王陵”说的主要依据均还有再商榷的余地,但铭文铜铃依然是太王陵墓主推定的最主要证物,那么对铭文铜铃使用时间与使用行为的考察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铭文铜铃出土于太王陵墓塚外侧,学界普遍认为其应是祭祀用品,如果太王陵墓主果真为广开土王,或许可以这样假设:第一,广开土王即位伊始便开始着手修筑自身陵墓(以下简称“寿陵制说”),若当年未完工,此铜铃可能为当年开工时或是年修建过程中的祭祀物品;若当年完工,也有可能是竣工时的祭祀物品。第二,此铜铃造于 391 年,但使用时间可能稍



图二

1. 铜铃及铭文电子扫描摹本(《王陵报告》) 2. 铜铃高清照片与铭文释读(张福有)

晚,甚至迟至广开土王去世。

我们首先讨论第一项假设的可能性。其一,根据《王陵报告》所言,作为墓葬的组成部分之一,太王陵阶坛外侧均有用石板铺排的散水,其中南侧散水外延约18~22米,而铭文铜铃出土于阶坛南侧2.9米的散水层之上,时代晚于散水,显然不是墓葬开工前的遗物。其二,《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壤王条载:“九年(391年)……夏五月,王薨”,表明广开土王即位时间不能早过是年五月,若铜铃铸造于同年年末,且最初使用的时间晚于太王陵竣工的时间,那么太王陵的修筑时间最长也只有区区七个月。石筑陵墓的修建需要经过石材的开采、加工、运输和修筑四个环节,太王陵一共使用大型石材逾2000块,以当时的人力物力,能否在短短七个月时间内修成规模如此庞大的陵墓尚有很大的疑问。以往在集安的调查已经发现高句丽时期采石场遗址,该采石场西南距集安县城23公里,位于当年高句丽北道边缘的通沟河畔,石料质地与太王陵、将军坟所用石材相同。调查者推测石材可能为春、夏、秋三季开采,趁冬季利用通沟河结冰进行运输<sup>[24]</sup>,这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太王陵于391年建成的可能。那么铜铃是否使用于391年太王陵修建中呢?需要指出的是,第一项假设以“寿陵制说”为先决条件,这也是《王陵报告》推定高句丽王陵墓主的重要前提之一,其引以为据的《后汉书·高句丽传》“生子长大,然后将还,便稍营送终之具”与《三国志·魏书·高句丽传》“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终之衣”的记载只提到高句丽保有子女成人和嫁娶后准备随葬用品的习俗,并未出现有关修陵建墓的只言片语,将古代文献表达的意思扩大化后再去附会今人学术观点的做法并不可取。相反,《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二》闵中王四年条载:“夏四月,王田于闵中原。秋七月,又田,见石窟,顾谓左右曰:‘吾死必葬于此,不须更作陵墓。’五年,王薨。”可见至少闵中王并未在即位后旋即修建陵墓,因此所谓高句丽“寿陵制说”还有待论据的进一步充实和验证。

表面上看,第二项假设将铜铃的制造时间与使用时间分离,不拘泥于“寿陵制”这一不成熟的前提,有其合理性。但是,铜铃作为祭祀用品,不论历史上或是现今,都具有明显的使用时效性

和使用场合的特定性,制造与使用时间的间隔必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这种特点在王室祭器,特别是纪年器的使用上体现得尤为显著。很难想象,391年好太王亲自下令制造的纪年铭文铜铃会出现在数年后,甚至自己死后“迁就山陵”时的祭祀现场。

通过上文的讨论,本文倾向于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高句丽的葬制中原本没有王即位伊始便修建陵墓的“寿陵制”,王陵的营建当始于高句丽王即位一段时间以后;第二,铭文铜铃为391年当年制造,可能被作为祭祀物品使用。以此为前提,并不能推导出太王陵墓主为广开土王的结果。笔者以为,较之广开土王,太王陵的墓主更有可能为广开土王之父——故国壤王,这样一来铭文铜铃不仅合情合理地成为广开土王即位当年制造的祭祀父亲之物,原本在“广开土王说”前提下的许多缺陷就有了更为合理的解释,讨论的重心也不必执着于求证诸多假说的可能性。同样,“愿太王陵(峻)安如山固如岳”铭文砖中的“太王”应指故国壤王,而并非指代广开土王。

包括铭文铜铃在内,本文列举的B型铜铃平均通高约为5厘米,质地、形制与尺寸相似的同类器在新罗金铃塚<sup>[25]</sup>、金冠塚<sup>[26]</sup>、天马塚<sup>[27]</sup>等墓葬内均有为数不少的发现,且与成套马具共出。上述新罗墓葬的发掘报告无一例外地称这类器物为“马铎”,以区别于器身呈球形的马铃,但二者均悬挂于马胸部的鞅带下起装饰作用,用途基本相同。由铭文可知,铜铃自名为“铃”,似可修正以往对这类器物的定名。《隋书·高丽传》载:“死者殡于屋内,经三年,择吉日而葬”,《北史·高丽传》因袭之。好太王碑碑文第一面第六行亦云“(广开土王)卅有九宴驾弃国,以甲寅年……迁就山陵”,广开土王卒于公元412年,葬于414年(甲寅年),碑文纪事与文献记载两相印证,足见该条文献所言不误。故国壤王卒于391年,同理可推知其应下葬于393年,铭文铜铃的制造年代显然要早于故国壤王下葬的年代。该铭文铜铃发现于太王陵墓外填土中,已无法确知其原始埋藏环境,但铜铃铭文最后的数字“九十六”却表明广开土王在391年至少一次铸造此类铜铃九十六枚之多,联系到上述新罗墓葬中同类马铃的大量出土,我们有理由推测马铃在结束

作为祭祀用品的使命后,可能最终成为太王陵(故国壤王陵)墓室内的随葬品。

如前文所述,学界已公认千秋墓、太王陵、将军坟前后相继,处于积石墓王陵的最后发展阶段,因此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应当将太王陵墓主的推定问题纳入上述三座王陵墓主探索的体系内来通盘加以考虑。以往我国研究者多将其中编年最晚的将军坟墓主推定为长寿王,部分日韩学者亦持同样观点,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在客观上成为太王陵墓主“广开土王说”的旁证。由于长寿王于公元427年迁都平壤,长寿王陵的所在便成为整个体系中无法回避的问题。魏存成认为“长寿王陵位于平壤,将军坟为‘虚宫’”<sup>[28]</sup>,张福有则提出“包括长寿王在内的高句丽平壤时期所有王在死后均回葬故国祖莹”的看法<sup>[29]</sup>。显然,前者仍然以“寿陵制说”作为立论的部分前提,后者则并未得到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的支持,已遭到部分研究者的批评<sup>[30]</sup>。在之前的研究中,笔者着眼于平壤定陵寺·传东明王陵<sup>[31]</sup>与大同北魏思远佛寺·永固陵在修筑年代与布局上的相似性,推定传东明王陵为长寿王陵<sup>[32]</sup>,而上文已经将太王陵推定为故国壤王陵,那么把将军坟比定为广开土王陵应当是一个较为稳妥的选择。

- [1]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编著. 集安高句丽王陵——1990~2003年集安高句丽王陵调查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 [2] 张福有,孙仁杰,迟勇. 朱蒙所葬之“龙山”及太王陵铜铃“岐”字考[J]. 东北史地,2006(1):23.
- [3] 李道学. 太王陵与将军坟的被葬者问题再论[C]//桓仁·集安地域高句丽遗迹发掘成果的检讨. 高句丽研究会2004年秋季学术大会.
- [4] 长寿王在位期间于427年迁都平壤,但目前国内外有多位学者持将军坟墓主“长寿王说”。
- [5]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 集安出土高句丽文物集粹[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56.
- [6] 吉林集安县文管所. 集安万宝汀墓区242号古墓清理简报[J]. 考古与文物,1982(6):16-19,28.
- [7] 同[1]:184.
- [8]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集安禹山0540号墓清理报告[J]. 北方文物,2009(1):20-31.

- [9] 方起东,林至德. 集安洞沟两座树立石碑的高句丽古墓[J]. 考古与文物,1983(2):42-48.
- [10] 同[6].
- [11] 赵俊杰,马健. 集安禹山41号高句丽壁画墓的时代[J]. 考古与文物,2014(1).
- [12] 吉林省博物馆集安考古队. 吉林集安麻线沟一号壁画墓[J]. 考古,1964(10):520-528.
- [13]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吉林集安长川二号封土墓发掘纪要[J]. 考古与文物,1983(1):22-27.
- [14] 赵俊杰,马健. 集安禹山两座高句丽时期积石墓的时代及相关问题[J]. 考古,2012(5):85-91.
- [15] (日)武田幸男. 高句丽史と东アジア[M]. 东京:岩波书店,1989:245-278.
- [16] (日)筱原启方. 高句丽国际秩序认识的成立与展开[D]. (韩)高丽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2005:15-21.
- [17] (韩)国立博物馆古迹调查报告(第1册). 壹杆塚与银铃塚[M]. 乙酉文化社,1948.
- [18] (日)池内宏,梅原未治. 通沟(上、下)[M]. 日满文化协会,1938,1940. 我们认为该墓墓主为牟头娄而非冉牟,参见赵俊杰. 再论高句丽“冉牟墓”的若干问题[C]//边疆考古研究(第11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217-230.
- [19] 中原郡高句丽碑文参看(韩)史学志(十三),檀国大学史学会,1979年.
- [20] 瑞凤塚正式发掘报告未发表,参看(日)小泉显夫. 庆州瑞凤塚の发掘[J]. 史学杂志,38(1),1927.
- [21] (韩)李熙濬. 太王陵墓主是谁?[J]. 韩国考古学报第59辑,2006:79.
- [22] 同[2]:图版五.
- [23] 同[1]:188图一五一.
- [24] 张雪岩. 集安高句丽时期的采石场[J]. 博物馆研究,1992(1):70-72.
- [25] 伪朝鲜总督府. 庆州金铃塚、履腹塚发掘调查报告[M]. 大正十三年度古迹调查报告第一册. 1931.
- [26] 伪朝鲜总督府. 庆州金冠塚及其遗宝[M]. 古迹调查特别报告第三册. 1924.
- [27] (韩)文化财管理局. 天马塚[M]. 1974.
- [28] 魏存成. 集安高句丽大型积石墓王陵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2007(4):174.
- [29] 张福有,迟勇,孙仁杰. 高句丽王陵通考[M]. 香港亚洲出版社,2007:76-79.
- [30] a. 苗威. 对高句丽“回葬”习俗的质疑[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3):15-20. b. 赵俊杰. 高句丽平壤期王陵考略[C]//边疆考古研究(第九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38-154.
- [31] (朝)金日成综合大学. 东明王陵及附近的高句丽遗迹[M]. 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1976.
- [32] 同[30]b.

(责任编辑 朱艳玲)